从长征路到莘县县城

——追寻上将杨勇在聊城的革命足迹



▲1947年杨勇（左三）任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与纵队领导合影

本报记者 张目伦
本报通讯员 牛贵葆 闫洪涛

11月10日，初冬的莘县，枝叶泛黄。莘县张寨镇苏村阻击战纪念碑前，旧碑字迹斑驳，新碑庄严肃穆。几位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干部轻声读着碑文；不远处，村道整洁，树林成行，孩子们在广场上嬉闹。莘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马章文指着纪念碑说：“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站在这里，更能体会‘牺牲’两个字的分量，也更能明白长征精神。”

杨勇，1912年生于湖南浏阳，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党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在沟口战役中立功，获三等红星奖章。长征途中，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的杨勇，率部大战土城、娄山关、遵义、老鸦山，四渡赤水，屡次完成上级下达的作战任务。红一、四方面军北上途中，张国焘一再进行反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。在阿坝，张国焘密令其支持者企图用武力裹挟党中央南下。杨勇坚持团结、坚持北上，奉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之命，率红四师十团机智勇敢地掩护中央领导机关迅速脱离危险区，走出松潘草地，翻越岷山，胜利到达陕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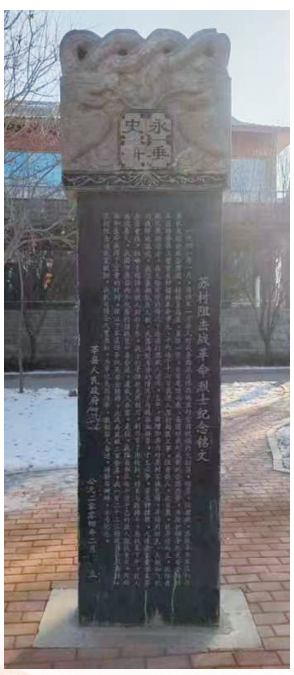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段长征经历，锻造了杨勇，也把一种精神带到了莘县。”马章文说。1939年3月，杨勇率部随第115师东进支队由晋西到达鲁西，指挥686团取得首战樊坝的胜利。此后数年，他在莘县组织群众、建立武装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。面对敌人，他发动群众大挖“抗日沟”，把大路小路挖成8尺深、6尺宽的壕沟，村与村相连。敌人汽车无法通行，群众却能迅速转移。当地群众编出顺口溜：“杨勇的兵个个是铁打的汉，出生入死不怕难。”

最惨烈的一仗，在苏村。1941年1月，日军纠集万余人扑向濮、范、观中心区。杨勇率军区机关跳出合围后，把掩护机关和上万名群众转移的阻击任务交给军区警卫营九、十两连。寨墙守不住就退守街道，街道守不住就上房，房顶守不住就逐巷逐院争夺。营长钟铭新腹部被弹片炸开，忍痛把肠子塞回腹内，用衣角堵住伤口，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；九连连长黄学友身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；二排长刘勇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，光荣牺牲；十连指导员严海元在房顶上抱着机枪扫射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……126名指战员英勇牺牲，以血肉之躯阻击十倍于己的日军陆空联合进攻，歼敌300余人、伤敌400余人。

“强将手下无弱兵。杨勇带出来的兵，个个是钢筋铁骨。”马章文说。1944年7月31日，杨勇审时度势、当即拍板，采用“里应外合、夜袭智取”方案攻打莘县城。午夜时分，城内敌工人员范永堂巧妙配合打开城门，部队迅速扑向伪军司令部和县政府，一枪未发，从床上活捉伪县长刘仙洲，随后攻占南门伪军据点和原日军司令部大院碉堡。杨勇亲自打电话，让押着刘仙洲到燕店、西吴家据点喊话，迫使4个伪军中队投降。仅用十个小时，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莘县城被攻克，莘县全境解放，3000名伪军大部分投降。

伟大长征精神给聊城留下了什么？它不只是纪念碑上的文字，而是化作了三样东西：不怕难的骨头、依靠群众的办法、顾全大局的担当。当年，杨勇把长征中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”的信念带到平原，挖抗日沟、打伏击、夜袭智取；今天，莘县把苏村阻击战纪念碑、中共冀南区委旧址等串成红色研学线路，党史故事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村庄。纪念碑周边环境提升了，来瞻仰、研学的人多了，村民在村口卖起农产品，日子越过越安稳。孩子们在碑前敬礼、记录，党员干部在碑前上党课——红色资源既是家门口的思政课堂，也是滋养青少年成长的精神沃土。

“红色文化不是抽象的，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在安稳日子里记得来路，在发展中更添底气。”马章文说。离开苏村时，夕阳洒在纪念碑上，树叶随风起伏哗哗作响。从长征路到莘县县城，杨勇和先烈们留下的，不只是一段抗战史，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。伟大长征精神在聊城落地生根，正转化为公众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

苏村阻击战纪念碑旧碑



1937年杨勇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时留影

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